

天津博物馆藏

部分代表性珍贵古籍

万历《本草纲目》

我国的先民对医学早有研究,在存世各类古籍中,医药类著作占有重要的地位。天津博物馆图书资料部藏有一部明万历本《本草纲目》尤为珍贵。此书集中国16世纪前中医学之大成,显示出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全面阐述所载药物知识,内容丰富而系统。本书虽为中药学专著,但涉及范围广泛,对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化学、农学等内容亦有很多记载。此书撰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至万历六年(1578),稿凡三易,天博这部万历年间刻本是相当接近成书时间的早期版本。展品黑条格,九行二十字不等,小字双行,三十八至四十字。白口,四周单边,版心上部刻书名,下为黑鱼尾。鱼尾下刻卷数,最下为刻工信息。

明万历四色套印《世说新语》

从现存套印的实物来看,元代就已经出现了朱墨套印的技术。但直到明后期,书籍套印技术才流传开来,发扬光大。最著名者就是明末湖州的闵、凌两家。明人陈继儒《史记抄》序云:“自冯道、毋昭裔为宰相,一变而为雕板。布衣毕昇再变而为活板。闵氏三变而为朱印,书日富亦日精。吴兴朱评书错出,无问贫富好丑,垂涎购之。”天津博物馆就收藏有一部明万历凌濛初四色套印本的《世说新语》。此书是南朝时期所作的文言志人小说集,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魏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明代流传《世说新语》版本众多,而展出的这部四色套印版正是前述湖州套印的典型作品。该书无格,八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十六字。白口,四周单边。版心上端为书名、卷数,下为篇名,最下为页数。该书共四色,印刷时需要雕四块印版,经过四道刷印方完成,成本颇高。该书正文黑色,红蓝标点,有三家批点,蓝笔为刘辰翁,朱笔为王思世,黄笔为刘应登,一目了然,精美异常。

《王文恪公集》

《王文恪公集》明三槐堂刻本,作者王鏊(1450—1524),字济之,号守溪,晚号拙叟,学者称其为震泽先生。谥号“文恪”,世称“王文恪”。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明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诗文名重一时,为弘治、正德间文体变革的先行者和楷模。该书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版本价值。

《二如亭群芳谱》

《二如亭群芳谱》明末刻本,(明)王象晋撰。该书为介绍栽培植物的著作。作者王象晋勇于纳新,广采博引,在政事之余潜心农事,集16世纪以前古代农学之大成,逐成该部植物学巨著,因此该书是不可多得的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兼备的古籍藏品。



【视点追踪】

日前,经过8个多月的努力,天津博物馆完成了首批100件(套)、1051册珍贵古籍的定级工作,这些古籍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涵盖了多个学科领域。经过专家论证评定,65件(套)、871册古籍文献入选二、三级文物,占报送总数的70%,同时也填补了天博图书资料部古籍文献无级别的历史空白。这些古籍文献的定级,是天津博物馆2023年4月份启动的馆藏古籍文献保护项目的一部分,天博针对古籍文献开展了全面普查清点、抢救性修复、预防性保护和定级等工作,为古籍的传世保护夯实了基础。



天博首批馆藏珍贵古籍完成定级

聊聊古籍定级背后那些事儿

本报记者 孙瑜

● 清点普查定级建档 古籍也需要“上户口”

天津博物馆图书资料部20余万册,其中线装古籍文献5.3万册,收藏量丰富,不乏善本、孤本,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除了珍贵的古籍典藏外,还有大量的天津地方史文献、珍贵的革命文献和民国时期旧期刊等重要历史文献。

据天津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田家馨介绍,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天津博物馆于2023年4月份启动了馆藏古籍文献保护项目,对古籍文献开展了全面普查清点、抢救性修复、预防性保护和定级等工作,并组织策划馆藏古籍文献专题展,努力让古籍“活”起来。

作为古籍保护的前提,全面清点普查尤为重要。在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的指导下,天博按照《古籍普查规范》要求,对古籍原书进行题名、著者、版本、年代、册数等信息进行电脑录入,通过细致入微的普查工作,对古籍整体情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为后续的古籍定级工作奠定基础。同时,完成馆藏古籍类文物定级建档工作,确定古籍级别等次,对古籍整理与保护也十分重要,田家馨说:“我们按照《古籍普查规范》要求分批次开展馆藏古籍类文物定级工作,依照《天津市文物藏品定级评审鉴定书》等相关规定,详细著录古籍版式、尺寸、行款、版本、装帧等内容,并参照

《汉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级第一部分:古籍》中一、二、三、四级的标准和要求,对古籍进行认真细致的分类和自评,整理了包括《本草纲目》《世说新语》《资治通鉴》《元史》《吕氏春秋》等古籍文献。”

另外,天博图书资料部联合文物保护技术部,对馆藏古籍文献保存现状开展调查,对古籍病害情况进行统计,发现病害多为断线、破皮、断口、虫蛀、老化等。为此,天博还与天津图书馆合作,积极开展古籍抢救性修复工作,对《王文恪公集》等近50册明版古籍及天津地方文献进行修复。

● 采集古籍数据 是技术活儿也是力气活儿

天博图书资料部一共有七名员工,在人员少任务重的前提下,不仅要担负起定级任务,还要做好日常的各项日常工作,每一名员工工作态度认真,责任心强,各司其职,通力合作,确保首批定级圆满完成,天博实现了馆藏古籍类文物定级零的突破。田家馨介绍说,“我们每天要保证三名员工到库房里工作一整天”,员工们都是早上一上班就到库房里埋头工作,只有中午吃饭的时候才出来透透气。

经过8个多月的努力,工作人员对天博馆藏古籍进行了系统梳理,首批报送了100件(套),总计1051册古籍。这些古籍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涵盖了多个学科领域,具有较高的价值。天津博物馆图书资料部杨晓辉说,他平时

主要负责线装书的相关工作,去年4月份古籍定级工作启动后,他与同事们一直处于紧张忙碌的状态。工作中三人一组,一人负责在电脑上处理数据、填写表格,另外两人负责提取古籍信息、采集数据并拍照。

一部古籍需要采集的信息点非常多,如:尺寸、年代、版本等数据,工作十分繁琐,有时采集一本古籍上的数据需要两天的时间。库房空间有限,工作人员经常是蹲着或者倾斜着身子,对每一个数据进行核查和录入。

在给古籍定级的前期准备过程中,拍照是很重要的环节,有着严格的要求。比如要在一组照片中体现整部古籍的数量、卷端、书名页等关键数据。前期的数据采集工作目的是为古籍鉴定专家提供一份准确的数据资料,这也是古籍定级过程中重要的参考依据,因此不能有任何疏漏,专家组根据工作人员提供的这些信息,对古籍的价值作出相应的判断。在8个多月的工作中,图书资料部的全体员工对定级工作的每一环节都高度负责,在古籍的搬运、测量、拍照等各个环节,工作人员始终秉持着专业与专注。

古籍并不像现代书籍有着标准制式,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尺寸。这就加大了古籍尺寸数据采集的难度。有的古籍由于采取传统的制作工艺,所以一套古籍往往册数很多,在采集数据时,必须拍摄一张将整套古籍显示完全的照片,所以拍摄时工作人员要借助梯子爬上爬下,站到高处才能拍摄全景。同时,古籍的卷端和书名页等相关内容的信息采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数据采集人员具备

相关的专业知识、深入了解古籍的时代特征,才能定位所需信息在书籍中的准确位置。

杨晓辉回忆道,在定级中遇到的困难有两种:第一种,古籍历经岁月洗礼,它的状态已经不稳定了,工作人员在取拿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不能出现任何的闪失,而且在操作的时候,要时刻保持高度的专注,这样的状态维持一天绝非易事;第二种,因为古籍的版本信息并不像现代图书那样标准,他们在采集信息时,就得反复翻找,直到找到能够作为定级依据的内容才可以。

因为古籍的珍贵与脆弱,工作人员在进行相关操作时,一方面,要严格避免汗水和污渍对古籍造成污染,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在翻阅过程中对古籍书页造成破损。为此,工作人员特地自制了指尖处剪开的手套。这种手套既能有效隔离汗水和污渍,保护古籍的清洁,又通过露出手指指尖,保持了敏感的触感,以实现精准、轻柔地翻页,从而避免对古籍书页造成损伤。

● 控温控湿除虫防霉 现代科技延缓古籍“衰老”

古籍具有不可再生性,使之不再遭受损坏是目前古籍保护中急需解决的问题。田家馨说,天博为古籍书库配备了温湿度控制器、紫外线除菌及防虫防霉设备与监测系统,这些设备能够有效预防古籍文献受到环境影响,确保其长期保存。

此外,天津博物馆图书资料部联合文物保护技术部使用低氧杀虫设备对馆藏古籍文献进行定期集中消毒杀菌,通过智能检测设备创造低氧、恒湿的储藏环境,使害虫因窒息死亡,并抑制霉菌繁殖。低氧消毒技术符合文物保护“最小干预”原则,在珍贵的古籍文献档案保护领域得到了普遍应用。

田家馨最后补充道,古籍定级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天博也将继续进行探索实践,为守护好中华文脉、推动古籍保护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非遗新传



年画历史悠久,相传清乾隆时期,天津地区民间年画作坊近百家,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通过运河路过天津,看到民间竟有如此内容丰富、色彩鲜活的艺术品,便将年画带回了宫中。后乾隆皇帝传旨“每年向朝廷进贡年画”,津沽手绘“贡尖”年画应运而生。如今,津沽手绘“贡尖”年画技艺在传承人的坚持和努力下代代相传,昔日的皇家贡品被数字化赋能,正在以全新的形式再次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赵岩作为津沽手绘“贡尖”年画的传承人,一直在思考传统技艺融入时尚生活的通路。

| 画年尖贡鲤津



曾为皇家贡品 鼎盛于清乾隆年间

记者: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津沽手绘“贡尖”年画的由来。

赵岩:其实津沽手绘“贡尖”年画,最难理解的就是“贡”“尖”二字。“贡”指的是过去属国或庶民进献给宫廷的东西,“尖”就是指最好的最上等的。因此,津沽手绘“贡尖”年画要符合几个条件,第一是要纯手绘的,并且是初绘的新品,第二就是要最大的最精美的,只有这样的年画才能进献给朝廷。

我国年画发展的历史久远,在年画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清乾隆年间是与天津年画密切相关的一个时代。过去天津年画叫“卫画”,代表着京津冀一带地区民间年画的风格。相传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通过运河路过天津时,发现天津的年画很漂亮,就将其带回了宫里。宫里的后妃也

津沽手绘“贡尖”年画 数字赋能,让非遗焕发生机

本报记者 徐雪霏

脸色着色的传统技艺来进行的。津沽手绘“贡尖”年画有八大题材,主要表达人们心中的喜庆、喜悦和吉祥。例如歌颂现实生活的时政题材、农耕题材、重大历史题材以及历史传说题材。

与数字化相结合 让年画重回人们的生活

记者:作为传承人,您在传承和保护年画方面有什么样的思考?

赵岩:清末著名手绘年画原创大师潘忠义将技艺传给他入室弟子——我的师父冯庆钺先生。在师父的带领下,我们成立了“津鲤贡尖年画”工作室,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这项非遗技艺。

2019年,津沽手绘“贡尖”年画被评为河东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随后2022年又被评为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们就觉得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如何让年画回到现实生活中,是我们最先考虑的问题。现在人们很少有贴年画的习惯了,大家对年画的作用也不是很了解的。其实年画并不仅仅是“过年用的画”,它的内容涵盖了太多,比如过去我们国家以农耕为主,识字的人并不多,那么人们就要用画来记录、表达。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九九消寒图》,在冬至当天,画一枝墨色梅花,上有九朵,每朵花九瓣,一共是81瓣。人们每天用红笔着色一瓣,等到全部花瓣都染红,就出了“九九”,寒冬已过,春天到来。这梅花也是有讲头的,比如晴点上边,阴天点下边,刮风点左边,下雨点右边,等八十一天过去后,再根据这幅图来判断明年的天气情况以及适合种植什么谷物。年画其实就是对一年里的重大事件以及自

然风物等进行记录,从而表达人们心情的一种画作。在新冠疫情发生初期,我们连夜创作了年画《七英图》,以传统经典历史人物(民间流传深远的爱国名将和忠良)为原型,运用深入人心的英雄爱国事迹,来表达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决心。我们希望人们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能够燃起希望,与困难斗争到底。

记者:那么如何让年画回到大众生活呢?

赵岩:关于这点我们做了很多尝试。首先就是要改变年画的使用场景,过去家家户户都是贴年画,但是现在的人大多没有这个习惯了,那我们就把年画应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使用的物品上,比如把精美的天津年画与陶瓷、雕塑、办公用品、商务礼品和生活家居装饰品相结合,让年画借助数字化赋能走入人们的生活,从而形成天津地方非遗文化代表性IP。

去年11月底,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举办。我们研发的数字化非遗代表性成果——“津鲤发光陶瓷杯”在现场发布,收获了不错的评价。

记者:将传统非遗与数字化相结合,您是如何想到这样的保护方式?

赵岩:2017年,我偶然接触到数字技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我开始将年画逐渐转化为动画IP,把年画娃娃变成动漫或许更容易让孩子们接受。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尝试,比如我们制作了《点赞天津》动漫系列宣传片、抗疫主题抖音短视频、抗疫主题数字年画、3D重彩动画IP——津鲤、生肖主题贡尖年画等,都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

2017年第十三届全运会,我们运用3D打印建模技术,结合流行的表情包,将传统的年画娃娃,打造成时尚的潮品手办。《全运宝宝表情公

仔)还入选了第十三届全运会特许商品。

2017年我们开始了津沽手绘“贡尖”年画非遗项目的数字化保护与开发项目,该项目在2019年被“国家文化产业发展项目库”收录入库。在数字化研发的过程中,我惊喜地发现,当我们把年画数字化之后,不仅产品变得更加丰富,同时大大降低了生产能耗、人员消耗和费用,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且保证产品标准化。

同时围绕天津文化,我们还开发出三个系列品牌。一个是“沾上有礼”传统年画品牌,主要是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与创新;一个是“津门有鲤”天津地方特色的文创品牌,比较贴近生活,主要是把天津地域特色的文化创意内容包进去;第三个是“津鲤”,把符合天津民俗和文化思想的产品囊括进来,形成能够代表天津文化特色的产品矩阵。为了更好地推广“津鲤”品牌,我还创作了“津鲤”的品牌故事:“九河东去汇龙宫,精卫填海陆地生,哪叱义胆陈唐氏,津鲤呈祥万业兴。”我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载体,将天津故事传播到世界各地。

记者:对于津沽手绘“贡尖”年画的创新传播我们看到了可喜的效果,那么在非遗传承方面,您有哪些想法?

赵岩:我认为传承是一种理念,虽然大家对传承的理解各有不同,但是从非遗保护的角度来看,传承不仅仅是传承技艺,还需要传承包含人文、社会、精神和思想等方面的内容。传承包括精神和物质。传承的不仅是技术、理念,还有匠心。可能从旁观者的角度而言,每天都在做一件事情,这就是匠心。但从我们的角度而言,匠人每天都在挑战自己,一是挑战外部压力,面对各种外界诱惑时思考如何抉择,二是挑战内部的压力,总希望这次画得比下一次好,不断完善和修改不足之处,不断发明工具,善借以物。我们每天都在坚守一件工作,包括我的老师,他80岁了,一天还能画十几个小时,这份坚持里既有自己的爱好,也有自己的追求。画画也是在领悟自己的人生。

非遗处在“非现代赛道”上,是民族精神的寄托。在这个时代,跨界创作需要传承人将非遗融入现代生活场景,将年画应用到各种场景中,并非必须用年画本身的表达方式体现文化。我们可以寻找不同载体,我们将这些传统元素与潮牌结合,比如设计年画元素的咖啡杯和可乐杯。我们致力于不断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交汇点,让传统年画依然能活跃在人们日常生活当中。